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本刊同仁祝各位丁酉年事事大吉，身體安康。企盼讀者在新年繼續予以支持。

——編者

## 香港政治文化的公共性危機

香港政治文化在近年來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中發生了重要變遷：「佔中」突破了違法性禁忌，旺角暴亂突破了暴力性禁忌，港獨訴求突破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憲制底線。如何理解這些政治文化的變遷現象？如何看待香港本土自決派的「制憲衝動」？如何評估香港民主的文化基礎？

葉蔭聰〈爭鬥式民主與公共文化：關於香港政治的觀察〉（《二十一世紀》2016年12月號）一文，從文化政治範式的角度提供了解析這一現象的三重進路：政治自由主義的公共文化範式、左翼馬克思主義的爭鬥式民主範式以及自決論範疇的制憲權範式。作者以「禮崩樂壞」切入論題。何為香港政治之「禮樂」？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所謂的「公共文化」，即作為整體社會與秩序黏合劑的公共理性。香港治理體系與自由民主秩序高度吻合，尤其是自由市場和法治更是居於國際先進行列。但這些標準化元件是否真的組構成了一個自足的自由民主秩序呢？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香港的政治文化「禮樂」並不能完全籠罩和馴化社會內部的反對力量，根源在於香港並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非自足的政治實體，而只是一國兩制下的自治體，因而政治自由主義範疇內的香港「一制」不能夠完整解釋和處理香港政治演化中的嚴峻衝突，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政改和主權的重大議題。香港的政治自由主義只是「治理」意義上的，而不是真正「憲制」意義上的。

左翼的激進民主範式仍然是「自由社會主義」範疇內的文化與政治競爭。這可以解釋為何反對派一方面訴求自決和港獨，另一方面又積極參加建制性選舉。這種行為有政治機會主義的面向，也有爭鬥式民主的內涵。若爭鬥成功，參與者可能放棄更激進的方案；相反則會激發失敗者重上街頭，訴諸某種具有「革命」意涵的制憲衝動。香港政治文化從「虛擬自由主義」的公共文化中蛻變，出現了中等強度的爭鬥式民主和高強度的港獨制憲衝動，這使得香港政治文化的公共性危機日益凸顯。

作者朦朧感知香港政治文化的公共性需要借助整體國家憲制的公共性進行理解和安頓，但卻未能就國家政治文化公共性提供適宜的詮釋與分析。隨着中港政治衝突的激烈化和香港本地政治文化公共性的更大分裂，偏於經濟互惠而

政治隔離的一國兩制或許需要嚴肅面對兩制的公共文化整合與國家認同建構問題了。這個問題單靠香港無法解決，而需要一國兩制的中期檢討及其2.0版本帶來改進版的文化基礎與憲制安排，否則無休止的街頭運動和2047制憲衝動就會成為實證憲制的永恆批判者與競爭者。

田飛龍 北京

2016.12.11

## 找回台灣的知識力量

錢永祥〈哲學與公共文化：台灣的經驗〉（《二十一世紀》2016年12月號）一文，對整個台灣人文學不再具有一種建構公共知識的性格感到憂慮並提出預警。近二十年來，台灣學院體制內的人文書寫距離公共文化的傳遞愈來愈遠，我們所建立的這一代人的學術書寫方法和典範將走向何方？有人感嘆未來的世代或許將看不到我們這一代台灣人文學者（特指1960年代出生）向當下社會發聲的深刻宏論，甚或一代知識人的學術洞見和思想靈魂就此隨風飄散。

不可諱言的是，當今台灣因為統獨撕裂的對立問題，深

深影響原來的島嶼書寫或論述中華文化的語境，特別是中國在崛起後所伴隨的一些文化建構的價值論述，歷史學界也討論得相當多。如同作者所言，台灣的公共文化過去所具有的人本主義的道德本質是台灣學者的優勢，而筆者更以為知識的語境必須有跨越邊界和打破國族神話的高度。作為以文字來傳遞思想的學者，兩岸三地的人文學者是否可以進一步凝聚起來，共同傳播一種共用的文化理想和共同價值，重新找回知識作為公共文化的一種力量？期待這不僅是高懸的理想而已。

吳翎君 台灣花蓮

2016.12.16

## 靈魂的雙重？身份的衝突？

在〈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再解丁玲之謎〉（《二十一世紀》2016年12月號）一文中，許紀霖將作家丁玲一生的經歷，簡要概括為靈魂的雙重性：既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又是一個任性的文人。當然，稱之為「信徒」，對應的不是特定宗教，而是紀律嚴明的列寧式政黨。文人崇尚自由，政黨講求服從。一旦遇到特殊歷史事件，個體多半會在文學與政治、公民與黨員之間搖擺糾纏。縱觀丁玲一生，與其說是靈魂的雙重，不如說是身份的衝突。

作為知識份子的丁玲，其後半生無疑是「反思性」的。簡言之，她不再如往前一般隨性書寫，且於日常生活中時刻注重言行。只是這種反思顯得不甚徹底，無論遭遇何種不幸，丁玲始終相信「組織

之善」，而不曾深究政黨的「可能之惡」。

與丁玲相比，梁漱溟同樣對身處的時代有所反思，但不同的是，梁的反思似乎更為通透。他所思考的，不是如何求得自己內心的安寧，而是帶着對「這個世界會好嗎」的追問，於動盪年代，鐵肩擔道義，擔當知識份子的責任，以此耕耘靈魂牧場。丁玲儘管始終有明星意識，但似乎已經忘記其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晚年經常提及的「信仰」，甚至也不是對列寧式政黨的篤信，而不過是為了求得自己的肉身心安。簡言之，政黨只是其達致「因信稱義」的工具，而非目的性心靈歸屬。因此，又怎能如其臨終所言：「我早成佛了」？畢竟，佛當普度眾生。

事實上，當下的知識份子在列寧式政黨之下，仍然可能複製丁玲式的衝突與不幸。如果說大變局之下丁玲還能期望「歷史作出公正的結論」，那麼當下的知識份子也許只剩「公道在民間」的樸素寄託了。在這個意義上，丁玲也許還算是一個幸運的知識份子。

陳斌 杭州

2016.12.10

## 誰的中國政治文化？

周濂的〈流沙狀態的當代中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2016年12月號）一文，主要從當代中國的自我想像、代際價值變遷與政治合法性三個論題探究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特點。在鋪陳開這些特點之前，作者首先將「政治文化」本身問題化，從「共識已死」的隱喻，追問甚至自我質疑其研究問題的前設

性根本問題，即當代中國是否存在所謂的「政治文化」。

通讀全文，其理論探討建立在「根據某某理論」、「按照某某框架」的基礎之上，對既定理論、概念、框架直接套用，缺乏充分的批判性分析。這導致其在理論概念與經驗材料之間存在脈絡化的鴻溝，削弱了論證的根基。周教授所「根據」和「按照」的，基本是西方的既定理論，以此來比對、驗證一個不正常的、甚至不存在的中國政治文化。這使其陷入了西方「規範理論」的迷思，將西方作為前設性的「理論」，而將中國作為驗證性的「數據」。這樣的「中國政治文化」，實際是西方的「中國政治文化」，不是中國的「中國政治文化」。

林仲軒 廣州

2016.12.17

## 致謝

《二十一世紀》謹在此向2016年曾協助評審投稿的專家學者致以謝意：卜偉華、王虎峰、王春光、吳啟訥、吳盛青、宋永毅、李小兵、李彭廣、李廣益、周林剛、周保松、金大陸、金觀濤、侯曉佳、唐少杰、徐賁、張健、梁英明、許成鋼、許紀霖、陳建華、陳峰、陳淑容、陳燕遐、渠敬東、程美寶、賀喜、項飆、黃文江、黃克武、黃勇、黃敏浩、楊伯淑、熊秉真、劉志偉、劉智鵬、劉曉原、劉曉麗、潘光哲、潘毅、閻小駿、蕭裕均、應星、韓鋼、羅志田、羅崗、龔浩敏（按筆畫序）。